

# 文化人類學解說在俄國語文教學之地位\*

－以普拉托諾夫作品為例就實際台灣教學情境之探討

賴盈銓\*\*

## 摘要

本文以安德烈·普拉托諾夫為題材，探討文化人類學解說之各種意涵，確立類似解說在台灣情境中，對實際俄語教學之重要性。本文1)闡述普拉托諾夫文學話語作為文化人類學解說實例之意義。2)詮釋翻譯分析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3)將文化人類學解說的內容分類，並舉其最顯要者如下：

1. 台灣讀者生活領域所缺乏情況之解說：例如植物、動物名稱；
2. 地名解說；
3. 人名之解說；
4. 各種概念、思想之解說：如神的概念、人的概念、啟示錄思想、天堂的概念、聖愚行為的概念；
5. 作家創作風格之解說：如作家運用修辭格、作家修辭手法特質之解說；
6. 文學理論之解說：(主要以主角性格，人物性格為例)。

最後歸納出上述文化人類學解說在台灣情境之俄語教學的意義。

關鍵字：文化人類學、國情學、作者風格

\* 本文主要內容曾發表於俄羅斯國立良贊師範大學主辦之「紀念史列茲涅夫斯基(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1812—1880)誕生190週年，斯拉夫語言、文學、文化國際學術會議」，2002年5/28-29。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俄語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最近數十年來，西方尤其是美國之文化研究發展出特殊之學科-「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類學既是跨科際的學門，其研究範圍相當廣<sup>1</sup>，它包括民族學、語言人類學、文化學、宗教人類學等、哲學人類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而在俄羅斯有關文化之研究理論則概括成爲「文化學」(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主要探討對象限於文化哲學、文化史、社會文化學，字面上的文化人類學 –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專門從事所謂古代民族之傳統習俗、信仰、生活方式等研究。而用語言與文學爲手段探討民族文化傳統則稱爲語文文化學(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sup>2</sup>，現今，語言國情學作爲對外俄語教學之理論與實踐已有相當進展。自十九世紀以來洪堡(W. Humboldt, 1767-1835)史列茲涅夫斯基(I. Sreznevsky)薩皮耳(E. Sapir, 1884-1939)沃爾夫(B. L. Whorf, 1897-1941)巴赫金(M. Bakhtin, 1895-1975)等許多學者投入語言與思想、文化彼此關係之研究，從而強化語文文化學理論深度。

畢竟，學習者若無法確切掌握所學習語言相關的歷史、文化(即文學話語知識)等背景知識，欲提升語言之說聽讀寫各種能力，有如緣木求魚。鑒於台灣學生對俄國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缺乏，因此，在實際俄語教學過程中，尤其在高年級階段，把文化人類學，尤其是語言人類學、文化學，當作重要學習內容的研究是必要的。

由教學經驗更可印證一個事實：在俄國藝術文學話語中，學生對俄國文化、社會、物質生活及實際狀況之感受，對俄國哲學、政治、社會問題之理解，特別感到困難。由於歷史發展情況之差異、哲學思維問題之隔閡，台灣學生在閱讀某些二十世紀俄國文學創作時，若缺乏相關背景知識與解說，經常難以進入作家之藝術及精神境界。然而，對極欲探究現代俄羅斯特質者，這些藝術創作實居不可或缺地位。文化人類學者既然是從事基本上爲異國語言、傳統之研究者<sup>3</sup>，我們將具有語言與文化對應性之背景說明稱爲文化人類學解說。

在所有難以理解之現代俄國藝術文學話語中，我們絕對有必要探討安德烈·普拉托諾夫

<sup>1</sup> 陳國強，文化人類學辭典，台北，2002，頁34。

<sup>2</sup> См. Д. Силче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 2000, сс.5-6.

<sup>3</sup> R. Keesing, A. Strather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sup>rd</sup> ed.1998 p.3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1899 – 1951) 作品之重要性。

普拉托諾夫的同時代傑出文化理論家巴赫金(М. Бахтин)稱：「小說為過去提供本質性、客觀的敘述，使我們對過去之了解成為可能」。「即小說傳遞給另一個時代的人一種臨在感(feel of presence)<sup>4</sup>」。

安德列·普拉托諾夫可謂時代精神之代表<sup>5</sup>。對外國學生，尤其是台灣學生而言，普氏作品雖然複雜、難以理解，然而將普氏作品列入教材中，代表一種特殊價值。因為普氏，不只可幫助讀者了解俄語語言形式運用之特性與本質，也有助於理解集權主義體制下，文化轉形期中俄羅斯心靈的奧秘。

普氏文學話語之複雜性，使得我們在台灣教授俄文時，有必要參考普氏作品之漢譯譯文，將翻譯譯文分析作為教學之重要媒介。

## 二、翻譯分析之地位

普氏文學話語之複雜性，使得我們在台灣教授俄文時，除應參考普氏作品之漢譯譯文，更有必要將翻譯譯文作為教學之重要媒介。

將文學話語之翻譯及翻譯分析作為教學重要方法之媒介係緣於翻譯本身就是跨學門的學科，不僅與語言科學息息相關，也與文學理論、認知科學、文化人類學及國情學緊密關聯。

目前，在台灣可找到普拉托諾夫下列的漢譯作品，有《歸來》、《老三》、《格拉朵夫城》<sup>6</sup>及普氏最主要著作之一《切文古爾鎮》。其中尤以《切文古爾鎮》對台灣讀者具重要性，不只因為新奇，而是此書具體表現出普拉托諾夫作品之典範風格、創作立場及藝術世界。研究《切文古爾鎮》漢譯本時<sup>7</sup>，我們注意到譯本有如下特徵：

1. 對《切文古爾鎮》主要人物持否定態度：在譯文摘要中，對小說創作之解釋有扭曲之嫌(引

<sup>4</sup> 閱 The Time literature Standard Review Utopia in the here and now, January 4, 2002. p. 10.

<sup>5</sup> 研究普拉托諾夫最著名的學者寇兒年柯(Н. Корниенко)預言「世人將會記得二十世紀 20-30 年代是普拉托諾夫時代，而不是列寧或史達林時代」。同註 4。

<sup>6</sup> 普拉托諾夫，《歸來》—蘇聯短篇小說大系，第三卷，p197-232，萬象圖書。

<sup>7</sup> 普拉托諾夫著，切文古爾鎮，古揚譯，廣西灕江出版社，1997。

譯文如下)：「...這部小說描寫一批流氓無產者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幹著反共產主義的勾當...。」此時思辯的焦點應在於主要人物之特質、作家立場及美學感受等問題。在筆者看來，將普拉托諾夫的主人翁「切文古爾人士」視為流氓實不太恰當，畢竟正如高爾基所形容，《切文古爾鎮》中的主要人物與其說是革命人士，不如說是「怪人」及「傻子」<sup>8</sup>。進而言之，普氏研究者一再指出，實際上，普拉托諾夫與其作品中人物並無太大思想差距，作家對自己筆下主人翁的愚昧、奇怪言行皆抱以極大同情及諒解。<sup>9</sup>

2. 在詮釋《切文古爾鎮》脫離「語言規範」之語句時，譯文未能忠實呈現或疏漏作家之「文學企圖」，例如：同語反覆、作者獨特的隱喻、借喻、矛盾修辭、將普遍動詞作為運動動詞使用等 (динаминация)：翻譯時，將原文語意、審美效果有所增損是極其自然之事，惟在教學過程中，若能將譯文與原文予以對照相互分析，可使讀者更明瞭譯文與原文語言體系之特性。

A、Люди слушают вождя, в истине опасной радости.

\* 「人們喫驚地聽領袖之審話，驚訝中有著一種危險的歡樂」。

B、Копёнки не любил входить в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и мог внезапно действовать.

\* 「卡朋金不喜歡爭論，可能會突然採取行動」。

C、На улице шуршали по земле люди.

\* 「人們在大街上走得刷刷有聲」。

D、Чего ты? – близким шумным голосом прошептала Фекла Степановна.

\* 「你怎麼啦？費奧克拉親切地對他悄聲說：.....」

\* 以上譯文引自普拉托諾夫著，*切文古爾鎮*，古揚譯，廣西灕江出版社，1997。

3. 《切文古爾鎮》對作品之註解、評論不足：「切文古爾鎮」本身充滿各種謎團、隱喻，如無

<sup>8</sup> Горь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70, с.313. 引自 В. Чалмаев. «Утонивающий колокол»//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Чевенгур».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 1989, с.616.

<sup>9</sup> 參閱 Hans Günther «Юродство и “ум” как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у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 Sprache und Erzählhaltung bei Andrej Platonov. SLAVICA HELVETICA Vol.58, с.117.

適當評論、譯註，其他國家文化背景之讀者很難領會作家之藝術境界，譬如下列話語之片段就有待適當的評論：

“你們是姊妹，”德瓦諾夫說，說時帶著一股柔情，顯然他回憶起了往事，而且還抱著一個心願—必須通過索尼亞這個姐姐為索尼亞做點好事。德瓦諾夫本人既不感到高興，也不感到完全無動於衷：他一直在注意傾聽心臟高度準確地工作。可是你看，心臟鬆動了，減速了，砰得響了一聲便閉合住了，它變得空空的。心臟剛才張得太大，沒料到放走了自己唯一的一只鳥兒。德瓦諾夫身上的看守人兼旁觀者目送正在走的鳥，只見它張開憂傷的翅膀，不明所以地帶著自己輕盈的軀體飛走了。看守人哭了起來—他是唯一的一次對人的生命哭泣，唯一的一次由於同情而喪失了自己的平靜。（標底線部分為筆者強調）

“你們是姊妹。”此話當然並不表達索尼雅·曼德洛娃（Соня Мандрова）與費奧克拉·史契潘諾夫娜間的血親關係，而是代表他們之間仍具有某種近似性<sup>10</sup>。毫無疑問，在小說的藝術語言中他們彼此的形象有互相交錯作用。

我們進一步以圖表說明二者在小說文本中彼此之關係：

女性本質	意義	氣味	光影	感受
索尼雅	智慧	芬芳的身體	光明	充實
費奧克拉	希望	枯萎	幽暗	空虛

在靈魂及內心的驅策下，德瓦諾夫「想要抱著她（索尼雅），為追求其它更好之印象，以嶄新、自由的心情向前」，然而，他仍舊「依戀著費奧克拉·史契潘諾夫娜」，費奧克拉此時就成為唯一真誠、水乳交融之愛的替代品。此時，譯者即有必要交代主角德瓦諾夫的「雙重性」<sup>11</sup>，否則譯文讀者無法明白為何「既不感到快樂，也不感到完全無動於衷」，也不能理

<sup>10</sup> 此處為作家對別雷（А. Белый）長詩《初約會（Первое свидание）的迴響〈Вы, сёстры-...〉 Надежда-лепетные слёзы, София- горний сведенборг!〉索尼亞（索尼亞）表示智慧。費奧克拉則意味著希望。引自 Е. Яблоков.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роману «Чевенгур». М., 1991. с.569

<sup>11</sup> 有關德瓦諾夫的「雙重性」請參閱本文人名解說及「哈姆雷特」類型人物之解說。

解心無意間釋放「唯一的鳥」的形象！它是愛情、良心、純真或者是某種物質？我們認為《切文古爾鎮》翻譯者務必藉著譯註，確定讀者理解之方向，否則，《切文古爾鎮》讀者之想像會有所侷限。上述翻譯分析可以說明普拉托諾夫話語譯本之多層次難度。

雖然，詩人布洛斯基（И. Бродский）曾警告，普拉托諾夫作品無法翻譯，但仍對任何意欲「重建」（筆者強調）這種評論時間、空間、生死本身的語言之企圖，表示讚許<sup>12</sup>。由此，翻譯分析可視為文化人類學解說要項之一，畢竟，翻譯不應只是根據「文化想像」所進行的重建或再現，而是試圖讓其他語族人士能與母語使用者同樣可以獲得長久以來所形成之接受美學（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翻譯分析之功用，正有助於達成上述目的。

### 三、文化人類學解說之類型：

文化人類學之概念既較傳統之語言國情學、文化學廣泛，不只包括語言體系、作者風格、詞彙、問題，更涵蓋民族宗教、思想及哲學概念體系。本文選擇安德列·普拉托諾夫最重要作品《切文古爾鎮》、《大地槽》做為文化人類學解說分析的題材，並將文化人類學解說的內容加以分類，舉其最顯要者如下：

1. 台灣讀者生活領域所缺乏情況之解說：例如植物、動物名稱；
2. 地名解說；
3. 人名之解說；
4. 各種概念、思想之解說：如神的概念、人的概念、啓示錄思想、天堂的概念、聖愚行為的概念；
5. 作家創作風格之解說：如作家運用修辭格、作家修辭手法特質之解說；
6. 文學理論之解說：（主要以主角性格，人物性格為例）。

我們以作品實例說明上述所區分之文化人類學解說類型：

---

<sup>12</sup> И. Бродский.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овести «Котлован». //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Мир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94. с. 156

## 1. 實際生活情景解說：

### (1) 植物：以牛蒡及玫瑰為例

#### A. 牛蒡 (лопух)：

在長篇小說《切文古爾鎮》中，札哈爾、帕夫洛維奇被定位成「來自大自然」的人，「他為躲避早晨陽光，傍晚時就將牛蒡放置於自己眼睛上」（Чевенгур, с. 5）<sup>13</sup>，而在另一篇小說《大地槽》中最顯著的形象仍是牛蒡。在多數台灣人心目中，牛蒡這種植物極可能只是健康可口食物，可煎、煮、炒，甚至可做成牛蒡茶，無其他特別的想像；而牛蒡在俄國則係生長在曠野、路旁雜草叢生之地，且俄文牛蒡 «лопух» 一詞具有「傻子」（Дурак）、「怪人」（странник）的隱喻。<sup>14</sup>在普拉托諾夫的作品中，經常扮演隨著流浪漢、漂泊者的形象。

#### B. 玫瑰 (роза)：

在歐洲文化史中，玫瑰具有相當固定及鮮明的語意「光環」，不僅象徵春天，之後也象徵愛情、死亡。在普氏藝術境界中，女性及母親的形象也與玫瑰、聖母的傳統形象相糾結。玫瑰「也是女性及神聖本質的象徵，不僅是阿芙羅戴特（Афродита）或維納斯（Венера），也是聖母的飾物，也象徵受難及勝利<sup>15</sup>。」

在普拉托諾夫很多作品中，「玫瑰」（亦即人名 Роза）形象係結合女性理想及母性主題，《切文古爾鎮》中的唐吉柯德人物、革命騎士卡朋金（Степан Копёнкин）崇拜日耳曼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Роза Люксембург），他將革命視為「羅莎·盧森堡最後殘餘身軀」（Ч. с. 104）：（卡朋金對世上事物的評價取決於事物對羅莎的態度），卡朋金對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的陶醉態度被描繪成在舉行某種「聖禮」（Таинство），Таинство 俄文原意即是「秘密、奧密」，「秘密」同樣也是玫瑰的象徵。

學者里斯特（В. Ристер）也確信普拉托諾夫是運用玫瑰的各種象徵以表達整體之哲學概念<sup>16</sup>，普氏之生命創造哲學認為，作為真正人的使命是將母親生育子女形象與由死滅的物

<sup>13</sup> 引自原典之話語部份之翻譯皆為筆者所作。

<sup>14</sup> 參閱「大俄漢詞典」：Лопух，黑龍江大學俄語系，商務印書館，北京，1989年。

<sup>15</sup> А.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Женщины и старины теории любви. М., 1990. с. 86-91.

<sup>16</sup> В. Ристер. Имя персонажа у А. Платонова // Russian literature. Amsterdam, 1988. Т.23. No. 2, с.135

質創造生命之花（玫瑰）的形象，富有深奧及多層次的象徵內涵。

（2）動物：以熊為例。

熊在俄國童話故事中，經常扮演重要角色，它的出現在普氏小說《大地槽》作品中，同時也居於鮮明地位，使小說添上神話色彩（迷思成分）。然而，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可能是非常突兀、不解。如果在俄文課堂中，則可針對這話題適時說明：在俄羅斯民間故事中，熊經常扮演傻子伊凡之助手，或給予傻子伊凡建議的角色，例如在《大地槽》中，熊不僅以鐵匠姿態出現，且幫助農民消除富農階級，此即是俄羅斯神話、寓言的再思考。

## 2 地名解說：

在各民族文化中，地名的起源經常圍繞著某種神話。《切文古爾鎮》小說之名稱正是小說之核心神話。切文古爾鎮（Чевенгур）是共產主義天堂，俄國民間故事中真理追尋者、搜神者（богоискатель）農民所嚮往之捷帝之城（Город Китеж），而依據赫勒（М. Я. Геллер）的釋義<sup>17</sup>，該詞係由達爾（В. И Даль）辭典中兩個詞構成：即「Чева」（切瓦）—指的是，而「гур」「鼓爾」—則意味「喧囂、吼聲，轟隆之聲」；故事主人翁沙夏、德凡諾夫有次思索著切文古爾的意涵時指出：『它好似不明國度的巨大轟隆聲』（Ч. с.163）。切文古爾就是農民穿草鞋者的烏托邦，與迷人的窮人國度招喚式的喧聲。

## 3 人名的解說：

通常名字之起源不在我們意識中；姓名之詞根亦不屬於話的語言，其意義通常亦無法感受到。然而，眾所週知，姓名之遊戲（亦即杜撰之姓名）、綽號，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文本中居重要成分（試比較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霍夫等作家之杜撰姓名）。『切文古爾鎮』小說中之主角—沙夏·德瓦諾夫（Саха Дванов）以其聲音之近似性，容易引起俄文讀者所熟悉之形象—亦即兩個伊凡<sup>18</sup>（Два Ивана），對於感受並理解主人翁之心理特徵及行爲，此一形象絕對不可或缺。沙夏·德瓦諾夫爲新時代的飄泊者，「這個人同時擁有兩

<sup>17</sup> М. Геллер.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частья. Париж, 1982, с.211-212.

<sup>18</sup> 引自 Е. Яблоков.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роману «Чевенгур». М., 1991. с.535. Е. Толстая – Сегал: Проза А. Платонова// Slavica Hiero solumitana. Jerusalem, 1978. Т.2. с.196.



個想法，而在兩者間都無法獲得慰藉」（Ч. с.327）。主人翁與史齊潘·卡朋金之革命騎士一樣，無法停留在安靜中：「每一個人甚至由於一日夜間之落腳，心中已蓄積著苦悶的力道」（Ч. с.113）。沙夏·德瓦諾夫正是自我及現實之「逃避者」（бегун）<sup>19</sup>。

#### 4 思想概念之解說：

所有普拉托諾夫基本藝術概念都是東正教思想，或者廣而言之，是基督教思想之再思考。所有這些概念無論是人的概念、神的概念、天堂的概念、不朽的概念等等，彼此互相重疊、交集，如同整體俄國文化、宗教思維之一部分。在台灣，由於居民多屬佛道及儒家之文化、信仰體系，因此，台灣學生對於上述理念、思想有相當程度之隔閡，同樣需要文化人類學方面之解說，我們扼要論述上述基本概念在普拉托諾夫話語中之具體表現，目的當然不在於徹底闡明所涉問題，而是突顯所涉概念在作家文本中之地位。

##### （1）神的概念：

普氏早期作品即洋溢著高爾基早期創作中所呈現的「造神」（бо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й мотив）母題。高爾基的短篇故事《懺悔》（Исповедь）中主角馬特維（Матвей），由於遭受無止盡磨難之結果，從人民，即無產階級，尋找到神的力量。換言之，這二位對革命抱有憧憬之作家已將人置於神之祚席之上，其實普拉托諾夫並不拒絕上帝，只是重新思考上帝。因此，他需要新聖經的語言：「每位無產階級都是基督，每個人都應依苦修犧牲之模式生活，而不是社會狹隘的階級、社團式的生活」<sup>20</sup>。與普拉托諾夫同時代的僑民哲學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與類似烏托邦式之躁進、渴望聯結天堂與純粹技術官僚之熱誠，變動的魔鬼式動力之概念的渴望，如同補償「人民」現今之所遭受折磨有所折衝之後，向類似的熱情人士說：「你們宣揚基督教式的托洛斯基主義」。貝加耶夫則將此劇變的時代稱為「上帝終結」的時代<sup>21</sup>。

##### （2）人的概念：

<sup>19</sup> 亦即舊教禮儀教派中之一支派。

<sup>20</sup> 普拉托諾夫 1919 年第八屆俄共黨（布爾什維克）代表大會發表之言論，引自 Чалмаев, Пленник свободы // «Страна философов»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Проблема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94. с.16.

<sup>21</sup> 同前揭書. с.20.

普拉托諾夫早期短篇故事《土地大翻修》(Ремонт Земли)的概念,「人把基督當作神,我們把基督當朋友」。在普氏此時期創作,人即是大自然的主宰,而在《切文古爾鎮》作品中,農民自稱是「上帝」(бог),靠吃泥土過活,所呈現的是人意欲成為創世者之野心,而不甘於僅當個神的受造物。此外,拉丁字源的「культура」文化一詞具有耕種之意涵,這些不事耕耘(культура)的切文古爾人士代表缺乏文化(без культуры),憑恃著原始感覺過活,冀望歷史終結,跳脫出死亡.....這些人尋找絕對、無限。普氏形容作品中的人為:「俄羅斯人雙面向行爲的人,能夠這樣過活,也能過全然相反的生活,而在這兩種情況都處之泰然」(Ч. с.79)。我們臆測,普氏談到人的相反生活方向,指的應是由死亡回歸到不死的概念,這也是普氏對當代天才思想家費得洛夫(Н. Федров)「共同事業哲學」(Философия общего дела)理論的迴響。<sup>22</sup>

### (3) 啓示錄思想與末世論思想：

《切文古爾鎮》及《大地槽》充滿啓示錄思想、末世思想及聖經題材。尤其是切文古爾鎮居民的情緒與普拉托諾夫同時代的宗教哲學家—布爾加可夫(С. Булгаков)所論述的東正教啓示錄思想相呼應<sup>23</sup>。切文古爾鎮是「逃亡者」教派份子所嚮往的上帝之國—捷帝之城的化身。由於教派思想明顯充塞於小說話語中,對基督教文化稍涉獵者必能將作家筆下的怪人認出,就是與逃亡者或者中世紀俄羅斯的教派份子。《切文古爾鎮》中的人物,卡朋金、沙夏、德瓦諾夫及帕辛契夫(Пашинцев)在精神上近似十七世紀俄國宗教分裂後四處雲遊之舊禮儀份子(старообрядцы)。普氏之人物雖是「『傻子』但仍完全自由自在的活著」(卡朋金之語)(Ч. с.190),且以自己的方式尋找 1917 年之後,神的真理、神的國度。(這時更直指涉共產主義天堂,羅莎、盧森堡)。「分裂的土壤上形成無政府思潮以及俄羅斯教派思想,離國家體制係為說明此地已無真理可言,擅此勝場的不是基督,而是敵基督」<sup>24</sup>。

### (4) 天堂概念及不死概念：

<sup>22</sup> 請閱 P. Bethea, the shape of apocalypse in modern Russian fiction. New Jersey. 1989, P. 160-161.

<sup>23</sup> 閱布爾加科夫,《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董友譯,香港:三聯書店。

<sup>24</sup> Н. 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УМСА-Press. 1971. с.15-16.

本體論主題：即生與死之永恒創作主題，經常盤繞在文人、思想家心中。死亡之問題折磨切文古爾人士，以致於一位漁夫（沙夏·德瓦諾夫之父親）為揭穿死亡的奧秘，投入湖底，而同樣作品中的中國水手則對死亡若無其事，說道：「我們很喜歡死亡！」（Ч. с.67）彷彿喝了魚湯之後，得以參透死亡之奧秘。普拉托諾夫無意間說有關於中國人的一句話，似乎揭露中國人與俄羅斯人對死亡觀之歧異，可能由於佛、道及儒家傳統，自然死亡在華人世界被認定是一種往生（亦即離開、登上彼岸），或是圓滿的形成、和諧或者天堂。而在作家的創作世界中，天堂的概念、天國的概念被共產主義理念取代，其具體形象則是《切文古爾鎮》或者是《大地槽》中的「普遍幸福的家園」（Дом всеобщего счастья）。然而，由於基督教文化中的啓示錄思想及末世思想，創作中的天堂不是以毀滅告終，就是幻化成墳墓、地獄。

#### （5）聖愚行為概念：

在分析作家創作之主要人物怪人、傻子形象時，同時也發現李哈喬夫（Д. Лихачёв）、潘成柯（А. Панченко）院士透徹研究的古俄羅斯詼諧文化（культура смеха）之傳統。古俄羅斯文化中，傻子與普拉托諾夫作品中最重要人物之最主要差別在於後者沉浸在社會主義或者某種哲學理念，而本文所提及的作品之主要人物幾乎執行同樣的功能：嘲笑自我及嘲笑世界。普氏變形的聖愚型人物完成諸如揭穿、預警、內心抗議甚至預言之嚴肅任務<sup>25</sup>。

#### 5、作家風格特色之解說：

普拉托諾夫主要作品《切文古爾鎮》、《大地槽》完成之時代，正是草根性語言特質滲透到標準語言領域之時刻。普氏作為時代的代言人以自己的創作手法呈現對現實深遂之透視。也正是類似呈現真實視野之方式，亦即世界圖像（картина мира），我們在台灣之社會、文化生活中，找不到類似之對應物。布洛斯基談論普拉托諾夫作品時，他特別指出作品中（尤其是《大地槽》）所表現出俄語特具絕境的哲學<sup>26</sup>（тупиковая философия），俄語作為綜合性語言與分析性語言（這裡指的是不只是英語，也包括漢語及其它詞形變化較少語言體系）之根本性差異，這也是普氏作品翻譯最棘手的部份。

<sup>25</sup> Инцюань Лай, Идея Юродств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Платонова.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2001. No 6. с. 15-19.

<sup>26</sup> 同註 12 с.154.

僅將普氏語言修辭最明顯特質舉例如下：

(1) 同語反覆：是修辭手法之一，經常出現於普拉托諾夫話語中，它如同是在失去正確言語時，用來逃避驚慌，表達無力、憤怒的方式：

1.... И как воз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плакал, лился неотложными слезами. (Котлован, с.213)

\*儘快地哭著，流著快速地眼淚。(大地槽)

2. Она ... умерла в вечном возрасте, в день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я личной жизни. (Котлован, с.211)

\*她.....死於永恆的年齡，個人生命的三十個年頭。(大地槽)

\*表示譯文只是參考對照之用，並非最理想之譯文版本。

(2) 二律背反式的詞組（矛盾修辭）：

矛盾修辭為結合意義對立之修辭手法，曾是二十世紀初，所有詩學體系及個別詩學體系中最先進之範疇<sup>27</sup>。而普拉托諾夫之二律背反式的詞組具有消彌情感與理智、深度與高度、高上與低下「狂歡化」（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之特質。

1. Прушевский ничему не возражал своему чувству. (Котлован, с.209)

\*普魯雪夫斯基情感上什麼都沒有異議。(大地槽)

2. ....для сна нужен покой ума. (Котлован, с.170)

\*.....需要理智的安寧，方能入夢。(大地槽)

3. ...отчего я ум чувствую и никак его не забуду (Котлован, с.277)

\*爲什麼我總是感覺到理智，且總無法忘懷（理智）？（大地槽）

4. Он стоял над кажущимся глубоким провалом, на берегу небесного озера. (Чевенгур)

\*他站在似乎是深的坑澗，在蒼穹似的湖岸。(切文古爾鎮)

5. Он видел смерть как другую губернию, которая расположена под небом, будто на дне прохладной воды... (Чевенгур, с.9)

\*他視死亡爲座落於天空底下，彷彿是涼涼湖水底層上的....（切文古爾鎮）

<sup>27</sup> Ковтун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эволюции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XX 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XX в. М., 1990. с.7-10.

(3) 抽象事物特徵、思想、時間、意識等具體化：

整個切文古爾就是由歷史、革命、共產主義、時間所組成，並被想像成某種肉眼可見事物的世界。

1. Чего же я его (коммунизм – Л. И) не вижу? Иль он не разрастается? (с.305)

\*爲什麼我沒看到呢？或者它還沒長出來？（切文古爾鎮）

(4) 將沒有生命的事物思考成有生命的，或者相反

作家在創作成熟期中，具體事物與抽象事物的界線不但消彌，而擬人化則是普氏作品隱喻的個別形式。

1. ... заболело сознание от напряжённого дыхания. (Котлован, с.259)

\*...意識由於緊張呼吸而生病。（大地槽）

2. ... его душа вспомнила, что истину она перестал знать. (Котлован, с.177)

\*他的心靈記得他停止知道真理。（大地槽）

3. .... Козлов ... опять ослаб! — Какой-то функции в нём не хватает! (Котлован, с.187)

\*柯茲洛夫又衰弱下來，他缺少某種功能。（大地槽）

(5) 普通行爲動詞之「動態化」：

動詞之動態化指的是動詞由於意義之緊縮，將動詞轉化成運動動詞，這些動詞之動態性及多異性未必在如俄語之綜合性語言系統之外得到順利轉換。

1. Ликвидировав кулаков в даль, Жачев не успокоился, ему стало труднее... (Котлован, с.256)

\*將富農消滅至遠方後，札契夫沒有安心下來，反而開始難過。（大地槽）

2. Некуда жить, вот и думаешь в голову. (Котлован, с.189)

\*無處可活，逕自往腦子裡想。（大地槽）

(6) 政治俗套的「狂歡化」<sup>28</sup>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

---

<sup>28</sup> 有關「狂歡化」理論請參閱 М. Бахтин. Творчество. Ф. Рабле и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и ренессанса. М. 1965.及劉康著，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譯。р. 261-265.

1. Мы должны мобилизовать крапиву на фрон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отлован, с.207)

\*我們應動員咬人貓到社會主義建設主義建設之前線上。(大地槽)

2. Мама отчего ты умираешь, от буржуйки или от смерти? (Котлован, с.195)

\*媽媽，你為什麼要死，是因為資產者，還是因為去死？(大地槽)

(試比較當時的口號「資產者去死(Смерть буржуйам!)!」)

(7) 脫離辭彙搭配的規範：

1. Из лунной тишины в дверь постучала чья-то негромкая рука. (Котлован, с.264)

\*由月光的寂靜處，某人輕聲的手敲著門。(大地槽)

2. Ей стало скучно по матери.(Котлован, с.213)

\*她開始想念母親(大地槽)

(試比較 Она скучала по матери.與 Ей стало скучно.的關係)

3. Пивник освежал своё заведение. (Котлован, с.171)

\*啤酒屋人員讓自己的店變得清新。(大地槽)

如上述所引用的例子，闡明藉著語法意義之再思考及擴充，而形成的語詞搭配的變形，並顯示普拉托諾夫修辭格之特性。傳統之修辭學理論無法完全解析隱藏著作家諸如怪誕、諷刺、荒謬、幽默等之文學企圖此為普氏語言之特殊現象。

(8) 文學理論之解說：

1) 主人翁個性：

作家最重要作品之主要人物以愚昧、聖愚行為及奇怪言行受矚目。諸如這些主人翁賦有聖愚行為理念、漂泊理念也近似作家之創作立場。普氏奇怪及漂泊雲遊的主人翁近似歐洲中世紀的小丑、傻子及搗蛋鬼的形象。巴赫金也同樣視這些人物為「作者觀點之持有者」<sup>29</sup>。我們可稱此一觀點為「聖愚式的視野」。熟悉俄羅斯文化之讀者必然瞭解，聖愚之社會功

<sup>29</sup> М. Бахтин.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М., 1986. с.198.

能不僅是同情近鄰、或慈悲，而且是詛咒世界、揭發強者、抗議暴力及權力之不義。歐洲中古世紀已流行過的愚痴精神，不僅再現於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作品，而且仍在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活靈活現。「理智無法理解俄羅斯…」( 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 )，詩人丘切夫(Ф. Тютчев)經常被引用的詩不僅闡明此一現象，也應證此一現象在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仍具實際性。

## 2) 「哈姆雷特」、「唐吉訶德」類型人物：

所有真正經典著作另人回味無窮之處，在於經世紀累積下，展現作品客觀潛在稟賦之價值。尤其是例如塞凡提斯之「唐吉訶德類型」的經典，經由讀者歷史詮釋而別具壯闊、創新力量。屠格涅夫文章中提到<sup>30</sup>：對唐吉訶德的詮釋已賦予這位騎士某種神聖的位格。或許杜斯妥也夫斯基認為唐吉訶德酷似聖愚。杜氏作品中有許多不少人物之舉止形同聖愚，或者是帶面具的聖愚。杜氏甚至以近乎耶穌基督的形象<sup>31</sup>「一個完全美好的人物」描繪小說《白痴》中主人翁－梅斯金公爵。唐吉訶德於現今也常與基督作對比，這可以說明二者都具有些聖愚形象。

《切文古爾鎮》小說中近似耶穌基督的人物應屬沙夏·德瓦諾夫·察麥耶夫(В. Чапмаев)認為德凡諾夫的行爲具有哈姆雷特及耶穌之形象<sup>32</sup>。德瓦諾夫近似哈姆雷特係因二者都為懷疑者，「他自己非常珍視，他自己卻不相信自我」<sup>33</sup>。因此，他經常飄泊不定的生命，耗在「To be or not to be」的猶豫畏縮裡。他背叛了擁有神聖智慧象徵的索菲亞·曼德若娃，且「依戀農婦費克拉·史契潘諾夫娜」。然而，這對他只是真誠血親之愛的代替品。他在農婦費克拉身上不過只找到類似空虛之物。儘管德諾夫智慧發達，對一切經常懷疑，且靜觀大自然及自我，無怪乎，他被作品中一位人物形容為「他經常思索兩種思想，而這兩種卻無法獲得慰藉」(Ч. с.327)。

切文鼓爾最明顯的唐吉訶德人物自然應推史齊潘·卡朋金，他殷殷企盼共產主義天堂的

<sup>30</sup> И. Тургенев. Гамлет и Дон Кихот// Русская критика, Сост. М. Белоусова, Лениздат, 1973. с.657-708.

<sup>31</sup> 閱：Ziolkowski, The Sanctification of Don Quixote, p.123.

<sup>32</sup> 同註 8，с. 637.

<sup>33</sup> 同註 30，с. 660.

來臨。他腰繫短刀，騎著名為「無產階級力量」（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сила）的馬，他迷戀日爾曼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嚮往飛往日爾曼的雲朵。由此，顯然可知，唐吉訶德及哈姆雷特類型的人物在烏托邦的切文古爾鎮若不是活在過去，就是未來，從而加重作品主人翁的悲劇性格，及小說的悲劇效果。

#### 四、結論：

上述文化人類學解說之例證，顯現普拉托諾夫語言之複調風格之特色，及時代之多重印記。普氏藉自己語言風格與自己同代人、時代進行對話。作家之話語中呈現出歷史、哲學、時代之思想理論的迴響。而共產主義思想與東正教道德哲學傳統之「互相為用」亦為重要作品之最特殊層面。普氏之語言、修辭特性形成於文化轉型期，具有巴赫金文化理論中之「狂歡化」色彩。最後，在文學理論層面，普氏創作為古俄羅斯及歐洲中世紀諷諧文化之延續與創新。而「哈姆雷特」及「唐吉訶德」作為作品人物類型，更突顯歐洲文學在俄國文學進化過程之特色。

上述各層面問題之基本解說，對於成長在截然不同的文化、歷史經驗的台灣學生而言，有若干程度「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之效果。本文引用之解說僅具範例性質，無法亦無意全面闡述所涉問題。我們深知，有些問題甚至值得以專書徹底探討，而且，上述各種解說、詮釋亦非絕對無可置疑；然而，應已足以作為台灣讀者進一步深入俄語及普拉托諾夫的藝術世界，探知整個俄羅斯心靈之重要基石。

#### 原典

1. А. Платонов. Чевенгур.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 1989. с. 654.
2. А. Платонов. «Взыскание погибших» М., 1995 (.«Котлован» 引[文部分])

#### 參考書目

1. Л. Шубин: Поиски смысла отдельного и общ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 1987.
2. Е. Верещагин В. Костомаров,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 1990



3.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6 трудов / Под. Т.А. Никоновой.- Воронеж, Изд-ва ВГУ, 1993, 196 с.
4. М. Геллер.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счастья. Париж, 1982, с.211-212.
5. «Страна философов»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4.- М., ИМЛИ РАН, «Наследие», 2000, 960 с.
6. М. Бахтин,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С., 1986.
7.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Мир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1994.- 432с.
8. Н. 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УМСА-Press. 1971. с. 15-16.
9. М. Бахтин. Творчество Франсуа Рабле и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и Ренессанса.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5.
10. Д. Лихаче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мех как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С-Петербург. 1977.
11. Н. Фёдоров. Сочинения. //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м. 85. Изд-во «мысль». М., 1982.
12. Д. Лихачев, А. Панченко, Смех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Ленинград. 1984.
13. Д. Силиче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 2000
14. «Страна Философов»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Наследие, 1993, -368 с.
15. Sprache und Erzählhaltung bei Andrej Platonov: SLAVICA HELVETICA Band/ vol. 58. Peter Lang. s. 117-132, s. 249-260.
16. R. Keesing, A. Strathern : Cultural Anthropology, 3<sup>rd</sup> ed.1998 p.3
17. E. Ziolkowski: The Sanctification of Don Quixote. Pensylvania. 1991. p. 123.
18. P. Bethea. The shape of Apocalypse in modern Russian fiction. New Jersey. 1989. pp. 145-185.
19. 賴盈銓, 安德烈·普拉托諾夫, 「聖愚行爲」的理念, 冠唐出版社, 台北, 2000, pp.142-185。
20. 謝·布爾加柯夫: 東正教－東正教教義綱要, 董友譯, 香港三聯書店, 1995, 頁 246－268。